

学术论坛 文集(一)

纪念百色起义五十周年

论文资料选编

一九八〇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XUESHU
JUNTAN

目 录

回顾历史 总结经验 继续长征 (代序)	黄松坚 (1)
百色起义	石舜瑾 (2)
百色起义前党的策略的转变	韦宝昌 (17)
广西右江地区土地革命运动	陈欣德 (24)
龙州起义时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	章尚文 (31)
李明瑞功绩试探	钟优武 (35)
黄日葵传略	石舜瑾 曾傅先 蒋文华 (45)

· 资 料 ·

中国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农民部工作报告	(60)
我们的口号	(70)
《宣传鼓动工作草案大纲》等文件	(71)
中国红军第八军目前实施政纲	(85)
中国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为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无理照会告全国民众书	(86)
中国共产党广西左江特别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八军军事委员会为 “二七”七周年纪念告左江工农兵劳苦群众	(87)
龙州工人纪念“二七”七周年大会纪要	(88)
龙州全市工人第三次代表大宣言	(88)
红军第八军士兵代表会议开幕志盛	(90)
红军出发进攻南宁	(90)

※ 资料部份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提供

回顾历史 总结经验 继续长征

(代序)

黄松坚

一九二九年底爆发的百色起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祖国南疆各族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又一次伟大斗争。在百色起义中建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在我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五十年过去了，当年可歌可泣的斗争岁月，仍然历历在目，使人难以忘怀。

一九二九年夏，以党中央代表邓小平（当时化名邓斌）同志为首的一批党员来到广西，给处在大革命失败后艰苦奋斗中的广西各族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广西的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武装起义的条件日渐成熟。记得百色起义前夕，我当时是凤山县县委书记，十月二十三日，我奉韦拔群同志密令，作为他的代表，从东兰出发，日夜兼程赶到恩隆县城平马镇（今田东县城）。十月廿五日到达后，便在邓小平、雷经天等同志的直接指挥下，参加了起义的准备工作。我的具体任务是给各地赶来的农军战士分发枪支以及筹备部分后勤物资。在党的周密布置下，我们将计就计，及时地解除了刚开到右江地区企图扑灭革命烈火的反动的第三大队的武装。二十八日凌晨，我们的队伍以出操演习为名，迅速地把驻在平马镇的第三大队成千名反动武装消灭了。同一天，张云逸同志在百色计擒了该大队长、反动分子熊镐。驻扎在右江沿岸各点的该大队其余部分，也同时被缴械。十月三十一日，我刚完成清点武器的任务，邓小平同志就指示我立即赶回东兰去，向韦拔群同志汇报，请韦拔群同志尽快地派一批人来平马镇领取武器弹药，迅速扩大革命武装，抓紧清除地方反动势力。我回去汇报后，韦拔群同志很高兴，立即布置我们开展工作。从十一月至十二月初，我们两次进攻了凤山县城。第二次攻占县城后，成立了县农民协会。百色起义的准备工作顺利地进行着，十二月十一日，百色起义成功了。第二年二月，龙州起义也胜利了。这一切，时机抓得那样准确及时，计划安排得那么周全巧妙，各方面配合得如此严密紧凑，说明了党的领导的坚强有力，也体现了广大革命战士高度的革命热情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

我们的事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正确领导下，依靠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取得的。这次纪念百色起义五十周年举行的学术讨论会，许多同志写文章总结了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这对于发扬革命光荣传统，进行新的长征，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对百色起义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研究工作，本来早就应该很好地进行，然而，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到现在才算真正开始。但为时还不太晚。祝愿我区的史学工作者与广大干部群众一起，不失时机地做好革命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探索其中规律性的东西，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作历史的借鉴。我相信这项重要工作，在我区史学工作者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百色起义

——纪念百色起义五十周年

石 舜 瑾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密布全国的军阀混战的阴霾中，百色起义胜利了。它象长空的惊雷，震撼了广西右江大地。邓小平、张云逸同志领导的百色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权，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系列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革命起义之一，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和红色政权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百色起义跟随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象湘鄂赣闽数省革命斗争一样，从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发展到武装起义和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它是广西农民革命斗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在广西进行兵运工作和农民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百色起义的胜利，又一次证明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继续坚持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道路。

一、百色起义前的政治形势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利益的桂系军阀统治着广西，对广西人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对工农革命斗争实行血腥的屠杀政策，社会矛盾极端尖锐。

广西的经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束缚，本来十分落后，除了梧州、南宁、柳州、桂林有极少数现代工矿企业和航运业以外，广大城乡处于分散劳动的农业、手工业状态，直至一九三〇年，广西的产业工人仅有2331人，只占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0.2%①。其他只有手工业工人和搬运工人。农业的比重很大，而且劳动生产率很低，一家两个劳动力和一头耕牛，一年耕种的水田仅能产糙米二千斤左右②。广大农村，还是“土纱家机布，瓦盏茶油灯”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是，就在这样落后的生产水平上，反动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却是极其残酷的，地主收租一般要占产量的五分之三，最高的占70%③。除了重租还有高利盘剥。沉重的军费更压得农民直不起腰来。广西东面与广东比邻，西面与云南接壤，北靠贵州、湖南。长期以来，川、滇、黔、湘、粤地方军阀无不觊觎广西，而广西内部的大小军阀又各霸一方，派系纷繁，互相火并，正是“司令满街走，将军多如狗，杀人兼越货，无日不干戈”。军阀军队一到，就派捐要粮，鱼肉人民。一九二五年，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的新桂系崛起，打败了旧桂系各派军阀统一广西以后，特设“饷捐局”，专收军费。这项饷捐自一九二七年初开始直到一九四一年冬才告结束④。饷捐与税收双管齐下，吮吸着人民的血汗。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蒋介石建立了反动统治以后，独吞了全国的田赋，而另设田赋附加归地方军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桂系军阀立即决定全省田赋附加迭增一倍⑤，一九三三

年广西的正税是二十四亿九千万元，附加税是二十三亿七千万元，正附两税几乎相等，农民的负担，就比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前加重了一倍⑥。除了田赋和田赋附加税以外，其他苛捐杂税更多如牛毛，总计达六百一十六种，农民养猪，就有什么猪仔捐，生猪捐，母猪捐，阉割捐，屠宰捐，肉案捐，卖猪所得捐，猪毛捐等等⑦。桂系军阀正是通过这些苛捐杂税，豢养一大批民团军警来维持他们对广西城乡的统治。

在地租、军饷、赋税、苛捐和高利贷的重重盘剥、帝国主义“洋货”日益渗入、物价逐日高涨的情况下，农民纷纷破产，广西农村更加贫困化。据苍梧、桂林和思恩（今环江县）三县二十二个村的调查（分别代表富裕、中等和贫穷三种不同地区），在一九二九年时，贫雇农占农村总户数的70%左右。三种不同地区的地主、富农、中农、贫雇农各占总户数的百分比如下：

	地 主	富 农	中 农	贫雇农
苍梧（6个村）	7.4	2.4	13.1	77.1
桂林（9个村）	1.9	11	19.2	67.9
思恩（7个村）	1.5	8.8	20.6	69.1 ⑧

广大贫苦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面对着谋生路绝的情况，不堪忍受压榨的农民不断发生自发的反抗斗争。百色起义前，右江两岸的农民斗争已如火如荼此起彼伏。

早在一九二二年，在韦拔群的领导下，广西东兰县就兴起过农民运动。一九二二年一月，韦拔群在东兰武篆领导农民反对“刘邓捐”（即地方军阀刘日福及其部下邓祖貽强收苛捐，每户五至十二元）的斗争，一九二二年三月，在武篆开展清算地主杜瑶甫侵吞群众捐助修建育才小学经费的斗争，一九二三年六月，清算地主韦龙甫的斗争，以至一九二三年七月至十月，三次攻打东兰县城，赶走勾结土豪镇压农民的县知事蒙元良的斗争。列宁指出：“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势必变成政治斗争。”⑨

一九二五年三月，韦拔群在广州中国共产党主办的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后，返回东兰，在东兰建立起了农民协会和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包括东兰、凤山、百色、凌云、奉议、恩隆、思林、河池、果德、都安、南丹等地的农民运动骨干276名。推动了右江两岸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一九二六年底东兰全县建立起了十一个区农会，拥有会员七万八千多人，建立了共有五百余人的农民自卫军。镇压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赶跑反对农运的县知事，砸烂了欺压农民的团防局，农会成了乡村政权，在东兰惨案后曾任东兰县县知事的陈勉恕（共产党员）指出：“在东兰的事实中，我们可以证明有了县官制团防制，是贪官污吏劣绅土豪的制造所，是农民的大敌，同时更知道如果农民有了组织，有了力量，则这种制度必即于崩溃，政府如果说要整顿吏治，肃清盗匪，除了切实扶助农民运动外，也决没有他途。”⑩一九二七年三月，凤山县建立了五十多个乡农民协会，在黄明春、廖源芳等的领导下，开展过清算、没收地主家财，镇压土豪，杀死团总，收缴团局枪械等斗争；凌云县在黄伯尧等领导下，夺取了土豪枪枝，斗争了土豪并没收其财产；果德县在黄书祥领导下，一九二七年三月，建立了县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开展清算县知事贪污罪行的斗争；都安县在一九二七年建立过县农民协会，大部分乡建有农民协会；黄治峰回到奉议县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举办了奉议县农民运动讲习所，在中共恩奉特支领导下，取得了斗争贪官县知事的胜利，一九二七年二月，成立县农民协会，黄治峰为主任。一九二七年三月，召开了恩隆、奉议两县农军会议，四月，正式成立了右江农民自卫军。

除了右江流域的农民运动外，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国共合作，推动其他各地农民运动。一九二六年三月至十一月，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七年四月，在南宁举办了两期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了农民运动骨干三百六十多名。一九二六年八月，在我党推荐下，派出了农民运动特派员，陈伯明到奉议，陈守和到恩隆，黄启滔到桂平，林培斌、李植华到苍梧，并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成立苍梧道农民运动办事处，主任是林培斌，一九二七年一月，成立了镇南道农民运动办事处，主任陈霁，一九二七年二月在恩隆成立了田南道农民运动办事处，主任陆炳堂。在共产党的积极领导下，广西许多地区的农民运动蓬勃开展，特别是镇南道、田南道所属各县的农民运动，为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和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右江地区的农民运动是在严重斗争中发展的。早在北伐战争的前夕，桂系军阀就制造了“东兰惨案”，对东兰农民运动进行血腥的镇压。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广西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指使东兰县知事黄守先，勾结土豪劣绅，民团土匪，捣毁了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一九二六年二月，黄绍竑密令驻百色军阀刘日福（旅长）派出一团兵力，在团长龚寿仪带领下配合黄守先，血洗了农民运动策源地东兰武篆区，几个月内，武篆和其他各区农民被杀害者一百四十余人，房屋被烧者六百一十四户，被勒索银元八万三千多元，被抢掠牛马二千四百多头，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东兰惨案”^⑪。但是，东兰农民运动在韦拔群领导下，一方面在西山成立东兰县革命委员会，领导农军组织锄奸团，镇压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与反动的军队民团进行武装斗争；一方面向全国发出《快邮代电》和派人到南宁等地，向各界报告东兰惨案情况，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一九二六年五月二日的《快电》中指出：“武篆一区，已焚去农村五十余村，农民被杀者二百余人，凡加入农民协会者均被处死刑，虽七旬老翁三岁孩童，莫能幸免。农民逃亡出外达六千余，该知事更向都彝长江等区惨杀，一面发出一种良民牌，价目自二十元起至千元止，农民购得此牌，方可回家耕作……”^⑫。在党的领导和坚决斗争下，桂系军阀慑于全国革命舆论的谴责，被迫于一九二七年一月通过了解决东兰农民运动的八条办法，不得不宣布将县知事黄守先“交法庭讯办”，不得不宣布通缉参与血洗东兰的土豪劣绅并没收其财产，农民免征赋税一年，并组织“东兰善后委员会”到东兰进行慰问^⑬，被迫承认东兰农民运动合法。

几个月以后，桂系军阀与蒋介石一起，同时在广西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农民运动得到的胜利果实，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土豪劣绅卷土重来，农民的赋税激增一倍。但是，右江地区的农民斗争，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建立的以余少杰为首的“三南总部”（田南道，镇南道，南宁道简称“三南”）的领导下，继续高涨。一九二七年七月，正式建立了右江各县农民自卫军，第一路是东兰凤山农军，总指挥韦拔群，第二路是恩隆、奉议农军，总指挥黄治峰，第三路是思林、果德农军，总指挥余少杰，付总指挥黄书祥。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黄治峰领导恩奉农军举行武装暴动，八月二十日，黄书祥领导果德农军进攻果德县城，九月余少杰领导农军攻入思林县城，一九二八年六月，黄书祥领导农军攻占那马县城，一九二八年一月，在陈洪涛领导下，农军攻占向都县城，一九二八年五月，养利县农民举行武装暴动。

由于封建的军事的残酷统治，广西农民的反抗斗争特别激烈，不仅从插血同盟，到建立农会，而且往往发展到武装冲突。这是广西农民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和优点。右江流域的农民运动不仅经受过东兰惨案那样严重白色恐怖的考验，而且还有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暴攻城那样的锻炼，这为百色起义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百色起义的胜利，不仅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而且党的领导的主观条件也已具备。百色起义前四年，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建立了各级组织，党的力量有了相当的发展。一九二五年七月，在五卅运动反帝高潮中，中共两广区委派共青团员龙启炎到梧州，建立了共青团梧州市支部，十一月，建立了中共梧州支部。以后，我党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中共党员毛简青到梧州的“中国国民党广西省立宣传员养成所”任教，积极发展组织；通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派中共党员粟丰、甘立申为国民党梧州市党部改组委员；通过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学员，中共党员林培斌、黄启滔、谢铁民、罗瑞贤委为农民运动特派员，派回广西工作。一九二六年一月，在中共梧州支部的基础上，组成中共梧州特委，中共两广区委派谭寿林任特委书记。一九二六年六月，中共梧州特委改组为广西地委，谭寿林为书记。随着广西的政治中心移向南宁，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也向南宁发展，一九二六年七月，党通过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中共党员黄日葵为第七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两广区委派黄日葵为特派员，并委派黄日葵、陈勉恕、谭寿林三人组成中共广西省委筹备组，领导筹备建立广西省委的工作，还派人到南宁、柳州组织南宁地委、柳州地委，派随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驻防平马的共产党员余少杰，负责建立右江党的组织。一九二六年八月，建立了中共恩（隆）奉（议）特别支部，余少杰任支部书记。从此，广西的许多地方，如怀集，桂平，贵县，玉林，全县，桂林，柳州，南宁和右江的恩隆，奉议，东兰先后建立了党的组织，成为各地领导革命斗争的核心。

当我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危及桂系军阀在广西的统治时，他们就对我党采取限制高压迫害以至血腥的屠杀政策。还在国共合作时的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黄绍竑指使反动军警包围梧州《民国日报》社，逮捕中共广西地委书记谭寿林，制造了梧州反革命事件。在我党的坚决斗争下，直至一九二七年三月，黄绍竑才被迫释放了谭寿林等人，但在同时又将黄日葵和谭寿林等我党主要负责人驱逐出广西。党又派廖梦樵等到梧州，恢复广西地委工作。

一九二七年四月初，桂系军阀参加了蒋介石在上海龙华秘密策划“清党”的反共会议，四月十二日，桂系军阀协同蒋介石在广西进行了反革命大逮捕，至五月初，在南宁一地就逮捕了共产党员雷沛涛等三百九十多人，九、十月间，雷沛涛、罗如川、高孤雁等二十七人惨遭枪杀。四月下旬，设在梧州的中共广西地委被破坏，共产党员甘立申牺牲；田南道农民运动办事处主任陆炳堂，镇南道农民运动办事处主任陈霁先后在百色、龙州被捕惨遭杀害。一九二七年八月，中共广西地委再次被破坏，地委书记廖梦樵牺牲。一九二八年一月广西地委改为广西特委。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贵县召开，成立中共广西省委，十一月，设在梧州的省委又遭破坏，一九二九年六月省委书记朱锡昂被捕牺牲。百色起义前夕，桂系军阀视共产党为心腹大患，妄图一举扑灭。正象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⑭严重的白色恐怖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只有拿起枪杆子，举行武装起义，以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各地的组织，特别是右江流域各级党的组织的建立，在大革命时期取得了组织工农运动的经验和经受了“四·一二”后严重白色恐怖的考验，为百色起义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百色起义的前夜，反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趋于白热化，军阀混战的枪炮声遍及全国和广西，这为百色起义提供了有利的时机。

桂系军阀自一九二六年初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参加北伐，其余十二个团留守广西以来，随着北伐战争的发展，桂系实力急骤膨胀。随着桂系的崛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时的蒋桂联盟遂告瓦解。一九二七年冬，李宗仁迫蒋下野。蒋桂矛盾日益成为反革命阵营中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八年十月指出：“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桂两派且在酝酿战争中。”^⑮一九二九年一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所谓“编遣会议”，企图通过编遣桂冯阎各派军队，达到削弱异己保存和发展他自己实力的目的。会上，蒋介石采取拉阎抑冯反桂系的策略，要把桂系编遣为八个师。同时，蒋介石分别在两湖、平津和两广部署兵力，积极准备用武力解决桂系。蒋桂之战已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在华中，蒋介石企图夺取两湖，切断武汉和桂系老巢广西的联系，委任亲蒋的鲁涤平为湖南省主席，并在九江、安庆一带密集大军，向湖南运进大批军火，积极部署进攻武汉。桂系为了发展和巩固自己的势力，竭力要把散处南北的兵力联成一气，决不容蒋介石插手湖南。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九日，李宗仁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免去鲁涤平湖南省主席的职务，任命倾向桂系的何键为湖南省主席，并派两个师的兵力，逼走鲁涤平，扶持何键于三月一日就职。于是蒋桂战争爆发。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蒋介石正式下令讨伐桂系，免去李宗仁、白崇禧本兼各职，二十九日亲赴九江督战，并以金钱收买和封官晋爵的办法拉走桂系在武汉前线的二个旅长李明瑞、杨腾辉，分别封为第十五师、第五十七师师长，并派蒋的亲信控制了这部分桂系势力，迫使桂系在武汉的另一部守军胡宗铎、陶钧放弃武汉，退走鄂西，不久亦即投降蒋介石。这样，桂系在武汉方面的防线全面瓦解，蒋介石不战而夺取了两湖和武汉。

在平津，蒋桂矛盾早在解决东北奉军问题中已十分尖锐。当时桂系主力已准备出关攻打张学良，并派密使联络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作内应。这时正是日军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之后不久，张学良的羽翼未丰，奉军实权操在杨宇霆手中。在杨宇霆已经买通的情况下，奉军垂手可以解决。蒋介石深怕桂系势力扩展，即派人将白崇禧的密谋告张学良，并叫张学良投蒋。张学良立即将杨宇霆处死，宣布易帜，归顺蒋介石。桂系对此十分恨蒋。当桂系在武汉告急时，白崇禧想回师策应。蒋介石秘密起用早已下野准备赴日的唐生智（蒋介石封其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由天津潜赴唐山，策动被桂系改编的唐生智的旧部，搞垮了桂系的第十三军，白崇禧只身从塘沽搭轮南下，其部队为唐生智旧部李品仙所收编。桂系在平津的势力顷刻为蒋介石所吞没。

在两广，蒋介石以第八路军总指挥的名义收买实力较强的粤军将领陈济棠。陈即在一九二九年三月底通电拥蒋，并限令在粤的桂军离境。三月，蒋介石又扣留粤军首脑李济深于南京，使与桂系关系密切的李济深鞭长莫及。一九二九年五月初，留守广西的第十五军在黄绍竑、白崇禧的率领下从梧州出发，向广州进攻，宣布讨蒋。五月四日，蒋介石下令免去黄绍竑本兼各职，再次宣布讨桂。战争开始后，桂军先胜后败，经广东花县一战，桂军溃退梧州。与此同时，蒋介石令湘军由全州攻占桂林，逐步向柳州推进；并调遣在两湖的李明瑞、杨腾辉两个师开赴汉口，顺江而下抵上海，经海路到广州，沿西江而上，进占梧州，上达桂平，七月上旬，直取南宁。一九二九年六、七月，蒋介石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为第四编遣区主任。坐镇广西的桂系军阀黄绍竑不得不经龙州退入越南。至此，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新桂系集团经过蒋桂战争，暂时宣告垮台。

俞作柏、李明瑞进入广西以后，采取了一些比较进步的措施，如俞作柏通令各县释放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桂系逮捕的共产党员，这引起了蒋介石的十分不满，企图撤掉

俞作柏。俞作柏、李明瑞与蒋介石的矛盾日趋尖锐。一九二九年八、九月间，汪精卫（改组派）、冯玉祥、阎锡山准备联合反蒋，派人到南宁联络俞作柏、李明瑞。俞作柏、李明瑞决定反蒋，九月下旬，宣布广西独立，十月三日，宣布讨蒋，李明瑞赶赴梧州命第十五师（师长吕焕炎）沿西江而下进攻广东。

俞作柏、李明瑞一面反对桂系，一面又要反蒋，深感自己力量之不足，为了发展他们的势力，表示愿与共产党接近，并要求共产党派干部来广西工作。我党对俞、李反蒋、反桂系的行动表示支持，并适时派大批干部到广西来。但又清醒地看到俞作柏、李明瑞在广西立足未稳，反蒋必遭失败，就积极利用时机，加速发展革命势力，为举行武装起义准备条件。果然，蒋介石收买了第十五师师长吕焕炎，十月中旬，李明瑞只带几个随从自梧州退回南宁，反蒋宣告失败。

这时，一九二九年十月，黄绍竑又潜回广西，打起“护党救国军”的旗号，重建了李、黄、白桂系政权。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上旬，桂系和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联合反蒋，进攻广东。张发奎的第四军从平乐、荔浦出击，桂系的第七军、第十五军从梧州倾巢出动，只留吕焕炎率其一部留守南宁。这时，蒋介石命何应钦赶到广东督战，并从华东调集三个师赴粤参战。十二月中旬，粤军三个师与张发奎军激战，张发奎败退广西；粤军另一部两个师与桂军激战，桂军败退，粤军进占梧州。就在桂系和张发奎军全线败退时，留守南宁的桂军吕焕炎又投蒋反桂，就任广西省主席兼讨逆军副总指挥，占据南宁、玉林、桂平等处。

正是在蒋桂混战、蒋军压境，桂系内部破裂，自顾不暇，后方空虚，反蒋反桂系的俞作柏、李明瑞退居左右江流域，广西境内一片昏暗，军阀混战乱作一团之机，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我党在右江地区领导了百色起义。

二、百色起义和红七军、右江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

一九二九年上半年，我党利用蒋桂矛盾，蒋桂冯阎军阀混战，特别是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的时机，派大批干部进入广西，先后有邓斌（即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⑩、龚鹤村（后叛变）、袁任远、叶季壮、李谦、李干辉、许卓、沈静斋、袁振武（即袁也烈）、冯达飞、何莽等人，由中央特派员邓斌负责领导。他们来广西后，即加紧对俞作柏、李明瑞的统一战线工作，并通过各种关系，分赴两条战线。一部分去做改造旧军队的士兵运动，一部分去右江流域加强各县农民运动。

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中共广西省委在南宁市郊区津头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广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派贺昌、邓斌同志出席参加，传达了党的“六大”决议和党中央指示，大会决定准备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大会通过了《广西农村工作草案大纲》、《宣传鼓动工作草案大纲》、《CY问题草案大纲》、《妇女运动草案大纲》、《职工运动草案大纲》、《组织问题草案大纲》。将中共广西省委改为中共广西特委，雷经天当选为中共广西特委书记。会后，各地代表赶回原地执行决议，加紧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关于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党通过共产党员俞作豫（俞作柏的弟弟，李明瑞的姑表弟，任广西警备第五大队长）向李明瑞建议，开办一个训练初级军官的教导队，为李明瑞所采纳。一九二九年六月，教导总队在南宁成立，派张云逸担任教导总队副主任，余惠任警备第

四大队政治部主任，其他如袁任远、王展、吴霖、阎柏英、何世昌、李朴、邓一凡等分别任教导总队政治教官或连排级军官。教导总队分三个营九个连共一千多人，连有党的秘密组织。由于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两个月内发展了三百多名新党员。一个多月后，张云逸任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长（原由土匪、民团改编而成，相当于一个团的兵力），李谦任副大队长，由教导总队抽一百多名党员任连排长。一个月后，广西警备第四大队由一千人扩大到二千多人。并且通过清算账目，把那些克扣军饷、打骂士兵、思想反动的旧军官撤换掉，由我党同志掌握了军队。一九二九年十月初，俞作柏、李明瑞宣布反蒋后，我党说服俞、李把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全部留守南宁，张云逸担任南宁警备司令，接管了省军械库，掌握了武器弹药。并由四大队派一个营去右江地区，五大队派一个营去左江地区，以退守为名实为建立革命根据地予作准备。

关于农民运动，党也加紧了工作。一九二九年八月，中共广西省委召开了广西省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广西省农民协会，雷经天、韦拔群为正、副主任。会议期间，在党的安排下，俞作柏接见了韦拔群，并发给步枪三百多枝，子弹两万多发。韦拔群立即调东兰农军三百多人到南宁，编成三个连进行集训。同时，俞作柏还拨出一批枪枝武装左江地区和南宁郊区农民。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一九二九年六月在平马建立了右江特委，特委书记由雷经天兼任。一九二九年九月，广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后，中共广西特委书记雷经天深入右江地区，并以广西农协特派员名义，在平马设立农协办事处。右江特委派严敏到东兰、凤山与韦拔群、黄明春联系，协助建立党的东兰、凤山临时县委，派陈鼓涛到向都与农春荣联系，派陈洪涛到恩隆，建立恩隆县委，派徐达生到奉议，建立奉议县委，派张震球到思林建立思林县委。农代会后，党还向俞作柏推荐，委任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党外进步人士担任左右江各县县长，如委任黄书祥为果德县长，黄大权为恩隆县长，潘亮甫为奉议县长，陈伯明为河池县长，林柏为向都县长，曾绳祖为天保县长。除东兰、天保外，其余各县政权都顺利地掌握在党所推荐的人手中。

一九二九年十月中旬，黄绍竑重占南宁，李明瑞、俞作柏败退龙州时，第五警备大队去左江一带，俞作豫被委任为左江督办；教导总队、警备第四大队去右江一带，张云逸被委任为右江督办。张云逸带教导总队及四大队沿陆路前进，十月十七日，邓斌率党委带军械船溯右江而上，同行的有陈豪人、叶季壮、龚鹤村、罗少彦、沈静斋、李谦、冯达飞、许卓、袁任远、李朴等。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日，大队到达平马，教导总队、警备第四大队、第三大队（原驻右江地区的恩隆、恩阳，这个大队是反动的）和附近农民群众万余人召开欢迎大会，会上，张云逸公开提出“打倒国民党，建立苏维埃”的口号。会后，警备第四大队继续前进，十月二十二日到达百色。邓斌召开了部队党的委员会（红七军成立后改为前敌委员会），决定公开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发动群众；整顿部队，继续肃清反动分子，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反对军阀制度，并补充部队；组织和武装群众，在有工农基础的地方，通过地方党组织，将枪枝发给群众，党把部队派到各地，帮助群众开展打土豪，收缴民团武器。根据党委的重要决定，百色起义的准备工作加紧进行。张云逸以“右江督办”身份，召开右江各县县长会议，筹措军队给养。将教导总队整编为四个连，并将毕业离队的学员分配到各县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收缴了百色伪警察局和附近民团的武器。对原来从吕焕炎部调来集训的一些反动学员的投降风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稳定了动摇分子，争取了大多数，孤立和清洗了少数拥蒋分子，使学员巩固地团结在革命阵营之中，纯洁和稳定了教导队内部。此外，为消灭反动的警备第三大队而进行紧张的斗争。十月底，警备第三

大队队长、反动分子熊镐，带领一帮军官到百色，妄图由他们接防百色。十月二十八日，张云逸在设宴欢迎时，由教导队学员巧计斩了熊镐。同日，警备第四大队第一营在雷经天指挥的恩隆、思林、奉议农民武装三百多人的配合下，消灭了驻在恩隆县平马镇的第三大队一部。接着在张云逸亲自指挥下，消灭了驻在恩阳县城那坡的第三大队另一部。至此，全部解决了反动的第三大队一千多人，缴枪七百多枝，消灭了右江地区的主要反动武装。与此同时，各县农民武装也积极消灭地主武装，相继攻克县城。十月底，东兰农军在韦拔群指挥下，攻入东兰县城；十二月初，凤山农军在李植华领导下，攻入凤山县城；十月，向都农军在林柏指挥下，攻克反动据点；十一月初，奉议农军在黄治峰领导下消灭反动民团。

经过一九二九年九月广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三个多月，特别是自十月大队离开南宁以来的二个多月的充分准备，举行武装起义的条件完全成熟。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初，派赴上海请示党中央的龚饮冰回到百色。党中央批准在右江、左江地区创造根据地，创造红军，颁发的番号是：在右江地区的是红七军，在左江地区的是红八军，委任张云逸为红七军军长，俞作豫为红八军军长，邓斌为红七军、红八军政委^①。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即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百色城头升起了镰刀锤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红旗，在红七军军部所在地百色镇粤东会馆前召开了大会，参加的有红七军排以上干部和直属队干部，陈豪人代表党委讲话。大会庄严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正式诞生。大会号召红七军全体同志，为完成党所给予的任务而奋斗，拥护苏维埃政府，发展苏区，扩大红军，坚决消灭反动派。群情振奋，口号震天，整个百色山城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

在大会上宣布了红七军的领导机构，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长张云逸，政委邓斌，参谋长龚鹤村，政治部主任陈豪人，经理处长叶季壮（后任政治部主任），秘书处长余惠。下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由原警备第四大队改编而成，纵队司令李谦，政治部主任沈静斋；第二纵队由原警备第四大队的机枪营特务营一部分及黄治峰、阮殿煊领导的思林、奉议、恩隆的农军整编而成，纵队司令胡斌（后为冯达飞），政治部主任袁任远；第三纵队由原东兰、凤山的农军编成，纵队司令韦拔群，政治部主任李朴。每个纵队相当一个大团，下辖三个营，每营下辖三、四个连，全军共约五千人。

同一天，在平马，召开了右江地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的有百色、那坡、田州、平马、果化等城镇工会的工人代表，百色、恩阳、奉议、恩隆、思林、果德、隆安、向都、镇结、东兰、凤山十一个县的农民代表和红七军士兵委员会的士兵代表共八十多人，成立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雷经天为右江工农民主政府主席，陈洪涛为肃反委员，李南山为劳动委员，韦玉梅为军事委员，刘伟谋为土地委员，蒋再兴为财政委员，韦拔群、罗文佳、黄大权、滕宣甫为政府委员，李铁南为政府秘书长。大会还讨论了扩大红军，组织地方赤卫军，实行土地革命，肃清反革命分子等问题，并通过了政治纲领（内容与《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相同）。当天下午在平马，举行了几万人的军民庆祝大会，会上右江工农民主政府主席雷经天讲话，宣告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诞生，张云逸专程赶到平马参加大会，在讲话中宣布了红七军的成立，并代表上级党委把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大印庄严地授予雷经天。右江工农民主政府设在平马。右江工农民主政权的成立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诞生，标志着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建立。

右江地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以后，各县也召开了工农代表大会，成立县工农民主政府。百色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关仲和，恩隆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滕德甫，奉议县工农民主政

府主席潘宪甫（后叛变），恩阳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农夫，思林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阮殿煊，果德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黄书祥，隆安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李干，向都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林柏，东兰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韦命周（后叛变），凤山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黄明春，镇结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汤学理，凌云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黄伯尧。南丹、河池、都安等县当时是游击区，还没有建立巩固的政权。

红七军成立后，部队党委改为前敌委员会，前委书记是邓斌，委员有张云逸、陈豪人、雷经天、李谦、龚鹤村等。前委统一领导红七军及右江地方党的工作，直接向中共中央负责。地方成立中共右江特委，雷经天任特委书记，委员有陈洪涛、陆浩仁、滕国栋、黄治峰、黄永达、严敏等。

党在准备右江流域的百色起义的同时，也积极进行左江流域的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一九二九年九月中共广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广西特委派何建南、麦锦汉等一批党员到龙州开展工农革命运动。十月，俞作豫率第五大队到龙州。十一月上旬，在百色起义工作部署就绪后，中共中央代表邓斌带领何世昌、严敏、袁振武等到龙州，给李明瑞做耐心的教育和争取工作，使他同意打起红旗；与俞作豫等研究，加紧进行改造第五大队的工作，加速准备左江流域的武装起义。之后，邓斌即离开龙州，经越南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

一九三〇年二月一日，举行了龙州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军长俞作豫，政委邓斌，政治部主任何世昌，李明瑞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同时成立了左江地区的革命政权左江革命委员会，主席王逸。龙州、上金、凭祥、宁明、明江、思乐、崇善、左县、雷平、养利等县也建立了工农民主政府。一九三〇年二月下旬，桂系军阀杨腾辉派梁朝玘师袭击龙州，红八军第二纵队司令宛旦平，左江特委书记严敏英勇牺牲；红八军另一部二百多人在第一纵队参谋长袁振武率领下，经过滇桂边境，历尽艰险，一九三〇年九月在天峨县境与红七军会合，正式编入红七军。

百色起义后，红七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在前委的领导下，为贯彻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十大纲领而奋斗。红七军颁布了《目前实施政纲》和《红七军布告》等文件，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政治形势作了正确的估量，制定了符合当时广西实际情况的行动策略；因而在实际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在《红七军布告》和《国民党罪状》中，指出了国民党新军阀依然是“帝国主义掠夺之工具”，揭露了国民党新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对帝国主义炮击南京的事件屈辱妥协，对中国人民在大革命中已经收回的汉口和九江的租界又拱手送给帝国主义，与日美英缔结出卖国家利益和主权的协定和条约，承认北洋军阀的一切借款和不平等条约^⑧，中国社会仍然是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又指出国民党新军阀骑在人民的头上，混战不休，中国仍然是一个法西斯统治下的半封建社会。“中国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被剥夺殆尽”，“加紧剥削群众，屠杀工农。”连年以来“各派军阀争夺地盘，混战局面日益扩大，苛捐杂税，无微不至，各地贪官污吏，豪绅地主，更借国民党为护符，穷凶极恶，横行无忌，人民处于水火之中，惨状实不堪言。”^⑨并以“四字经”的形式，揭露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反动实质，“以党治国，放屁胡说；提高党权，罪恶滔天；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清党反共，革命送终；”^⑩明确指出了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外没有民族独立，对内人民没有民主权利。

根据以上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红七军布告中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出华，推翻国民党统治，肃清贪官污吏豪绅地主等反动势力，建设工农兵代表会议——苏

维埃政权，以解除民众痛苦”^{②①}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民主革命任务。

为了贯彻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十大纲领，前委还规定了十六条具体的实施纲领。指出对外要“扩大反帝运动，用民众革命力量，驱逐帝国主义出华，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对内要“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要走毛泽东开辟的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的道路，“推翻乡村豪绅地主的统治，乡村政权交乡村苏维埃！”“扩大红军割据区域，迅速与朱毛会合，实现割据两广！”实行土地革命，“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归苏维埃分给农民”等^{②②}。

在前委制定的纲领和路线指引下，红七军坚持对敌斗争，深入土地革命，为建立右江流域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而奋斗。

一九三〇年一月，红七军趁桂系军阀忙于蒋桂战争，主力东调，吕焕炎又揭出反桂旗帜，桂系内部分裂，南宁空虚之机，提出了“打到南宁去”的口号，二月四日，在隆安与桂系三个团遭遇，激战三天后，撤离隆安到东兰、凤山地区整编。这时，黄绍竑率两个团进驻平马、百色，各县工农民主政府暂时撤退到山区，两个月内，右江两岸根据地各城镇尽失。但在根据地，红七军以游击战袭扰敌人，打得敌人“不得安宁”，黄绍竑无可奈何地承认，红七军“对当地群众曾予以相当的组织和训练，所以我们要继续深入进攻，是有相当的困难”，最后向李宗仁发出电报，不得不表示“引咎辞职”^{②③}。三月初，前委在凤山盘阳乡举行会议，决定到外线贵州游击。当时，贵州军阀与湖南军阀正在湘黔边界混战，驻守后方的行会议，决定到外线贵州游击。当时，贵州军阀与湖南军阀正在湘黔边界混战，驻守后方的仅五百多人，其余只有地主民团一千人左右。一九三〇年四月，张云逸李明瑞率军部及第一、二纵队上贵州，第三纵队留守后方巩固根据地。一、二纵队三千多人从河池出发，经怀远镇（今宜山县）到思恩，遭到敌杨腾辉部袭击，一纵与二纵被迫分开，后军部率二纵经宜北到贵州的荔波与一纵汇合，五月一日，攻下榕江县城，三天后，回师右江，从黔桂边界的福祿、宜北直下东兰、都安、凤山、天峨，出广西至贵州的古州，又东下百色，与守敌岑建英团激战数日，消灭该敌，六月初，收复百色以及右江沿岸各县。一九三〇年六月，桂系联合冯阎，对蒋发动中原大战，出兵湖南，蒋桂战争重新爆发。蒋介石命云南军阀龙云、卢汉经过右江地区向南宁进发攻击桂系侧后。红七军在果德一带伏击滇军，激战五昼夜，缴获大量军火，后在平马休整。红七军转战广西、贵州边境，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发动了群众，又经过三个月的整训，政治上更加巩固，并补充了几千名新战士，一九三〇年八月，红七军第四纵队成立，黄治峰任司令，罗少彦任政治部主任。红七军更加壮大坚强。

当红七军主力到外线出击时，右江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也步步深入。百色起义后，前委明确指出：“对农民，组织农协，土地革命，打倒地主，消灭豪绅，租税尽取消，土地归农民。”^{②④}一九三〇年三月，邓斌从龙州经靖西、思林、恩隆到东兰的武篆，带回了红四军在井冈山的土地革命经验，在东里屯搞土地改革和共耕社的试点，制定了右江地区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一九三〇年五月一日，右江工农政府颁布了《土地法暂行条例》。条例指出：“目前中国革命任务之一是深入土地革命。而土地之取得更为乡村农民之实际要求。”正确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要求土地的强烈愿望，条例规定“立即无代价的没收地主豪绅阶级之土地财产”，“销毁豪绅、地主、政府的一切田契及其他剥削农民的契约”，规定“没收之土地财产均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以乡为单位”，“以人口为标准”，“完全分给无地或地少的农民使用”。“宣布一切高利贷的借约无效，并即刻焚毁。”^{②⑤}根据土地法暂行条例，右江流域各县的土地改革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各乡首先将所有农户的土地契

约一律烧毁，废止债务关系，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牛、马。但在开始时，曾出现过过左现象，如规定地主之孤寡，其土地被没收后不得再分给土地，以后，在实际斗争中逐步纠正，对不是反动的地主也分给一份坏地。《土地法暂行条例》还规定：“如在某种军事困难时期，乏人耕种土地时，可由苏维埃指定用共耕的办法以解决之。”韦拔群的家乡东里屯全屯一百二十多户，在韦拔群的带动下，参加了共耕社。在东里屯试点的基础上，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五日，右江工农民政府颁布了《共耕条例》。一九三〇年东里屯共耕社粮食生产获得丰收，每户平均分得二千多斤，还剩余一万多斤。

与土地改革的同时，也进行了肃反斗争。开始时，区乡政府凡捉到反动的豪绅地主，都直接处决，攻下豪绅地主寨子，一律杀光，对边界群众，大部分看作反动派，造成赤白对立。后来，在实际斗争中逐步纠正过来，规定“对敌军，只打军阀，不打士兵，优待俘虏，不究团丁”，并“严禁烧杀”^{②6}。

对于工商业，开始时发生过没收地主兼商人的商店的现象；有的县、区笼统提出打倒奸商的口号；有的商人关门外逃时，就将其商店全部没收，改为合作社。对这些过左的倾向，后来也逐步加以纠正，明确规定了“对商民，废除苛捐，取消杂税，保护贸易，买卖公平，严守我军纪，绝不扰商民”的政策^{②7}。

对少数民族，红七军坚决贯彻壮、瑶、汉一家的民族平等的政策，特别对瑶族，规定免除瑶役，分配土地，可与汉、壮人一样居住乡村，政府中有一定比例的瑶族委员。一九三〇年四月，红七军进入黔桂边界苗族地区时，由于坚决执行了民族平等的政策，红军纪律严明，赢得了苗胞的拥护，顺利地通过了苗山。

对妇女工作，红七军也十分重视，提出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上，男女一律平等，许多妇女还参加了政权机关和红七军，发挥了妇女的重要作用。为了迅速提高妇女干部的水平，还举办过多期妇女干部训练班。

前委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和加强党的领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发出了《红七军前委通告》（第二号），规定了党的组织工作大纲。指出在“取得起义胜利以后的有利形势下，党能否加强对于红军之领导，并在工农群众中建立巩固的基础，则与红军的前途及右江各县群众工作均有莫大的关系。”前委要求党的各级组织“以最大的努力”，“以最大力量来注意”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在组织上，前委汲取了红四军“支部建在连上”的经验，规定“前委之下各纵队设队委。纵队之下，各营设营委。每连队设一支部，军官与士兵同志混合组织。”规定了军队党与地方党的关系，指出要指定一部分同志专负地方党的工作，以健全地方党组织，“地方党部与所在地军队中最高党部发生平行关系，但受前委之指挥”，以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在党内加强集体领导，指出：“党内一切重要问题均应召集各级委员会讨论决定。”实行民主化，“党内一切问题如无极端秘密性者，均交各级指导机关及各支部讨论。”同时，指出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防止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党内一切决定任何同志均须遵从，不能随便以个人意见而更动之。”下级机关要服从上级机关的命令，党员向组织、下级向上级要定期汇报。在思想上，规定要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健全支部生活，

“小组会议多讨论党的基本理论问题”，“支部会应多讨论本支部的实际问题。”并规定要加强党员训练，创造干部分子，“平马、百色、东兰即开办中坚同志训练班，在短期内施以基本理论之训练。”^{②8}根据前委的指示，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加强了各级党组织的建设。东兰县委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正式成立，黄举平任县委书记，以后建立了七个区委，各乡建立了党支部，至一九三〇年底，全县党员发展至一千多人；凤山县委在一九二九年十二

月建立，县委书记韦菁；其他各县也相继成立县委，果德县委书记黄书祥，思林县委书记陈鼓涛，凌云县委书记黄伯尧。为了加强党和军队的政治思想建设，经常开办党员训练班。如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三日，在东兰武篆区旧州屯开办党员训练班，学习了党纲和《党员须知》，时间一星期，学员二百多人；一九三〇年春，在东兰武篆区第三纵队部开办军政训练班，韦拔群任训练班主任；一九三〇年四月，邓斌、雷经天在东兰武篆旧州屯主办党员训练班，时间一个月，邓斌亲自编写了《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土地革命的政策、口号等，并印成小册子发给学员学习。此外，在红军中，编有《政治讨论》的教材，通过启发式的讨论，明确什么是政权，什么是社会，什么是军队，什么是苏维埃等问题，对战士进行生动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教育；还编有工农识字课本，积极提高红军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水平。

由上可知，百色起义以后，在以邓斌为首的前委领导下，红七军和右江地区各级党委坚决贯彻了前委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对敌军事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加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使右江流域的革命形势一派大好。

但是，正当红七军经过半年战斗，右江革命根据地经过土地革命，初步站稳了脚跟时，在一九三〇年六月，立三路线统治了党中央，通过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的胜利的错误决议。八月间，党中央派邓岗到平马，传达立三路线，要红七军打下桂林、柳州，到广东的小北江建立根据地，阻止两广军阀北上增援武汉，以保证实现两湖的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然后夺取广州，实现南方的胜利。对于立三路线给予红七军的行动策略，党内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红七军力量还不够强大，根据地还不够巩固，急于去攻打柳州、桂林是没有胜利把握的，应待以后再作考虑，前委书记、红七军政委邓斌，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持这种意见；有的是根本反对中央的意见，主张红七军固守右江根据地，这以右江特委书记雷经天为代表；还有一种意见以陈豪人代表，他们以执行中央指示为名，实际是向往城市，不愿在他们认为贫穷落后的右江地区长期坚持，并以谁不执行中央指示谁就是反对中央的大帽子压人。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日，红七军从平马、田州出发，到河池集中。十一月初在河池举行了红七军第一次党代大会，改选前委，整编红七军，决议执行中央指示，决定红七军去攻打柳州、桂林。改选后的前委书记是陈豪人，委员有邓岗、邓斌、张云逸、龚鹤村、李谦、黄一平、许卓、袁任远等，前委在中央代表邓岗领导下工作。把持有不同意见的雷经天开除党籍（清算立三路线后恢复党籍）。十一月初，红七军进行了整编，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政委邓斌，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参谋长龚鹤村，经理处长叶季壮，总务处长袁任远。下辖三个师，第十九师师长龚鹤村，兼政委邓斌，政治部主任许进，下辖五十五、五十六两个团；第二十师师长李谦，兼政委陈豪人，副师长黄治峰，政治部主任李朴，下辖五十八、五十九两个团；第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政委陈洪涛，副师长黄明春。决定第十九师、二十师七千多人北上，第二十一师由韦拔群率一百二十多人枪回东兰，把东兰、凤山、都安、恩隆、奉议等县的赤卫军编成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三个团，坚持右江地区的游击战争。红七军在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日从河池出发，经过广西、贵州、湖南、广东、江西，行程一万二千里，经过大小百余次战斗，于一九三一年七月到达中央根据地，在江西兴国县桥头镇与中央红军会合，这时红七军只剩下二千多人。一九三一年九月，红七军编为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李天佑。从此，红七军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

毛泽东同志指出：“每当一省或几省之间的白色政权有一个暂时稳定的时候，那一省的统治阶级或几省的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用尽力量来消灭这个红色政权。”^②一九三〇年十

一月，滇桂军阀混战结束，一九三一年二月，桂系廖磊的第七军勾结贵州军阀王海平，“围剿”凤山、东兰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一年六月，红七军第二十一师改为右江独立师，师长韦拔群，政委陈洪涛。一九三二年九月，在白崇禧的策划和廖磊的直接指挥下，以五倍于我的兵力，共五千多人进攻东兰西山根据地。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九日，韦拔群同志被叛徒暗害牺牲，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陈洪涛同志为叛徒出卖被捕，在百色英勇就义。右江革命根据地终于丧失，许多革命群众惨遭杀害，百色恐怖笼罩着右江大地。但是，百色起义播下的火种始终没有熄灭，右江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

三、百色起义胜利的原因和意义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百色起义的胜利不是偶然的，它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为百色起义奠定了社会基础。大革命失败后的广西和全国一样，尖锐的社会矛盾象布满了的干柴。如前所述，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蒋桂军阀及其他军阀之间混战的加剧，赋税和租息的加重，使广大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求业无望求生不得，由于地主的反攻倒算，农民更加仇恨地主，反抗愈演愈烈，但是农民的任何反抗，又遭到桂系军阀的血腥镇压，这更使国民党反动派和广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至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处于极端尖锐的对立状态。同时，国民党广大士兵由于粮饷不足，经常处于困苦的环境之中，加上受过大革命时期民主精神的影响，争取一部分士兵的支持也有一定的可能。这一切使百色起义有了深厚的社会基础，是百色起义发生和胜利的根本原因。地主资产阶级散布的百色起义是共产党派外来干部制造暴动的谬论，是完全错误的。第二，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斗争，为百色起义留下了革命火种。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广西各族人民，在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进行了英勇的革命斗争，特别是东兰和右江流域的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在中共两广区委的领导下，广西各地建立了党的组织。这不仅为百色起义播下革命火种，而且为百色起义打下了组织基础。在党中央派来大批干部的直接领导下，百色起义就得以一举成功。第三，军阀混战为百色起义提供了有利时机。百色起义前，有蒋桂之间，粤桂之间，桂系联合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与蒋介石之间的不断混战，在桂系不断失败和桂系内部不断分裂的情况下，给了我党以准备起义的有利条件和充裕时间。百色起义后，又有蒋桂冯阎中原大战，滇桂之间，粤桂之间，湘黔之间混战不息，使我得以深入土地革命、巩固根据地和发展壮大红军。毛泽东同志指出：“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②第四，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经验帮助下，在毛泽东同志建设井冈山根据地经验的帮助下，以邓斌同志为首的前委，根据“六大”制定的政治纲领，在起义以前和以后采取的政策是正确的，加上各级党组织的坚强有力，这是百色起义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关于武装起义的地点，不是选择在大革命时期虽然党的组织基础较好，而当时为桂系军阀主力盘踞的梧州和玉林地区，也不在虽然国民党势力已呈内部空虚但属反革命影响较深的中心城市南宁，而选择在有深厚的农民运动基础、远离中心城市、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百色地区。百色起义吸取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百色起义不同于在中心城市举行的广州起义，而是在离开中心城市南宁后再举义旗；不同于起义后未向农村进军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的南昌起义，而是先开赴农村，与农民武装汇合后再举行起义；也不同于先举行武装起义，后向农村根据地进军的秋收起义，而是先奔

赴农村，肃清根据地内主要反动势力后再宣布起义。从南宁兵变，到平马宣布“建立苏维埃”，到百色宣布武装起义，坚持了毛泽东同志向井冈山进军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且比秋收起义更自觉更从容。这说明我党在领导武装起义的斗争中，随着革命斗争实践的深入而更加成熟。百色起义为党领导的武装起义提供了自己的经验。毛泽东同志指出：“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③，百色起义前，党委卓有成效地着力于正式红军的建立，一手抓国民党军队的士兵运动，加紧改造旧军队，一手抓农民运动，建立工农武装。对旧军队，前委区别其从旧营垒中分化出来的民主派和死心塌地与革命为敌的顽固派，对前者采取团结教育争取改造的政策，成功地争取了以李明瑞为代表的一大批同志参加革命，对后者采取坚决打击消灭的政策，如对第三大队的熊镐等，党经过合法斗争和秘密工作，使旧军队逐步改造成为革命武装。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就是在改造国民党的旧军队并和右江流域的农民武装相结合的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百色起义胜利后，前委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验为榜样，制定了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以及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和根据地建设与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有力地巩固了百色起义的胜利。当然，百色起义也和其他起义一样，也有自己的深刻的教训，如在进攻方向上，起义后曾以很大的注意力放在沿江城镇上，并且在起义后即提出“打到南宁去”的口号，把第三纵队也调离根据地去攻打南宁，虽然这是争取李明瑞的需要，但经隆安、亭泗之战，使初创的红军受到很大打击，根据地城镇尽失，红七军主力不得不离开根据地到外线游击。攻打南宁的行动，一方面是对敌强我弱的形势作了唯心主义的估量，一方面也是受城市中心论思想影响的反映；虽然红七军不去攻打南宁也会遭到桂系军阀的进攻，但我军可以避免如隆安、亭泗战斗那样的损失。在外线出击回来后，红七军攻打蒋桂之战中假道百色攻击桂军侧后的滇军，虽有缴获，但自己也受到相当的损失。当时本应利用矛盾，打击自己直接的主要的敌人桂系，但却攻击滇军箝制其后路，这样客观上有利于桂系，而不利于削弱其力量。至于以后第四纵队的建立，虽使红七军得到扩大，但把农民武装过多地集中到正规军，削弱了地方武装，对根据地的巩固是不利的。虽然红七军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这只是第二位的，有的是革命发展过程中难于避免的。

百色起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之一，在我党历史上有其不容磨灭的意义。第一，百色起义创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红七军后来虽然受到立三路线的干扰，多经周折，但终于胜利地到达中央根据地，参加了保卫中央根据地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后即编入红三军团，成为红一方面军的一部参加了长征。这是中国共产党“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④的重要成果之一。第二，百色起义创造了右江革命根据地，在十二个县的范围内推翻了地主豪绅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开展了土地革命，配合了湘、鄂、赣、闽根据地的斗争，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了又一面革命红旗，展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形势。虽然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根据地不久即告丧失，工农民主政权只存在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右江流域的革命斗争一直坚持到全国的解放。第三，百色起义涌现出了一大批干部，他们土生土长，联系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考验，学会了治党治国治军，以后在党和国家的各条战线上，成为重要的骨干。

长期以来，林彪、“四人帮”出于其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目的，竭力攻击邓小平同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恣意贬低、歪曲和诋毁百色起义，或者以突出毛主席为幌子，根本避而不提百色起义，妄图从历史上抹掉百色起义，或者只提百色起义，而不提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前委的领导，或者以红七军执行立三路线为罪名，攻击百色起义的路线是错误